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

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

叶世昌 施正康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综述了自鸦片战争至 1949 年间中国的思想家们对发展市场经济的种种理论和主张。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导论,简述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和本书的结构。其余五章为:对外通商思想的发展,金融建设思想,对建设资金的思考,企业制度思想,面向市场的农业发展思想。这五方面涵盖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各章又按专题分节,分别介绍了各种思想的发展脉络,论点连贯,线条清晰。1919—1949 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经济思想却极为丰富。作者在发掘这方面的资料上作了一些努力,使本书能同当代的市场经济思想相衔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了解中国昨天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

顾 问	蒋学模	张薰华	陈观烈
	洪文达	叶世昌	洪远朋
	尹伯成	苏东水	顾国祥

主 编	伍柏麟
-----	-----

副 主 编	姜波克	黄亚钧	刘子馨
	袁志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磊	刘子馨	华 民
	朱国宏	张 军	苏荣刚
	芮明杰	张晖明	陆德明
	周伟林	姜波克	袁志刚
	徐惠平	黄亚钧	彭希哲
	戴星翼		

序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启发下,我决定写一部《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中国近代(1840—1949)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封建”,就是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近代的市场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是很不完备的。一百余年间,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种种学习西方、发展中国经济的理论和主张,其中有很多同市场经济有关。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问题还在探索中,中国近代的市场经济思想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少。对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作一系统的研究,为经济工作者提供一本较好的参考书,就是我想写本书的初衷。

1993年得到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本课题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计划于1996年完成。立项后主要由我和施正康副教授共同承担,当时的博士生李舒瑾亦协助部分工作。课题基本上按时完成,并通过了评审。在准备出版本书时,我又对课题成果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进一步扩充了篇幅。所以作为书稿交复旦大学出版社时已经是1998年秋了。

本书按专题分章节。在保持全书的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各章节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一节对所论述的问题都勾勒出了基本面貌,查阅方便。各种思想的出现原则上按时间的早迟顺序排列,有时为了行文的需要,前后稍作交叉也是有的。对每一种观点的提出,都写明提出的时间。有些文献原来没有标明写作时间的,我们

通过分析或考证,尽量予以确定。有些论著的写作年份和发表或出版年份不一致,一般以发表或出版年份为准。

本书按专题论述,出场的人物多,故难以再介绍人物的生平。有些人只用几个字说明他当时的身分,而且前面已说过的后面不再重复。有少数人身分不明,本书亦不作任何介绍。

本书在资料收集上下了一番工夫,其中从未被前人引用过的资料占有相当比例。即使是引用过的,也根据本书的要求重新从分析原始资料下手。但是,中国近代的经济论文和著作如林。特别是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论文和著作,不要说全部,就是看过大部分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是有重点地收集,以书籍(包括专著和论文集)为主,适当补以杂志上的论文,并尽量扩大收集面,有遗漏在所难免。从已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类著作来看,本书在资料收集上是填补了不少空白的。

本书清代部分的年份用年号而不用公元。因为每年夏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公元究竟属于本年还是下一年,要经过具体的推算,不胜其繁,不如用年号以存其真。每节出现的同一年号注一次公元年份,以便对照。

本书的引文都注明出处。为了避免过分烦琐,单篇文章一般注篇目,不注页数。单篇文章较长,查找不便,则注页数或其他表示范围的文字。非论文集类的著作注页数。需要加注版别的加注版别,同一种书比较集中出现时则只注一次版别。

引文的标点,凡原来无新式标点的都由我们按己意标点。已经过近人点校的引文,我们可以采用其标点,也可以不采用。故如书中注明据某种已经标点的版本的引文,只表示引文的文字据此书,并无表示标点也据此书的意思。标点和所引书不一致是容许的,因为它并不是原作者的标点。至于原来已有新式标点的引书,则标点也原封不动地照引,只对个别明显印错的略作订正。

引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都改用标准的简体字。人名中的繁体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和本书的结构.....	9
第二章 对外通商思想的发展	17
第一节 对外通商思想的确立	17
第二节 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	25
第三节 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思想	41
第三章 金融建设思想	63
第一节 自铸银元和建立本位制度的讨论	63
第二节 纸币思想的发展和纸币制度的建立	82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银行建设思想.....	101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银行建设思想.....	114
第四章 对建设资金的思考	129
第一节 利用外资思想——外商间接投资.....	129
第二节 利用外资思想——外商直接投资.....	150
第三节 发掘国内资金思想.....	166
第五章 企业制度思想	189
第一节 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思想.....	189
第二节 企业产权关系思想.....	202
第三节 发展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思想.....	217
第四节 企业管理思想.....	231
第六章 面向市场的农业发展思想	251

第一节	传统农本思想的演化·····	251
第二节	对农业地位作用问题的新认识·····	260
第三节	对农产品商品化利弊的分析·····	278
第四节	农业技术改造思想·····	292
第五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	310

字或异体字一般不改。有一个字需要特别提出。据《辞海》，“藉”的一义是“借”的繁体字。但现在的简体字本中仍常出现作为“借”的繁体字“藉”。本书引文中如涉及此字都改作“借”。

本书分六章。前三章由我撰写，其中第一章曾参考了施正康所写的稿子，第二章曾参考了李舒瑾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研究》及一篇文稿，第三章银行部分曾参考了冯郁的硕士论文《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建设思想概述》。后三章由施正康写出初稿。我在此基础上进行通稿，统一体例，核实资料，对行文顺序作了调整，并进一步充实内容。两人的观点无大差异，如略有不同之处，则按照我的观点作了修改。

本书引文都有出处，故不另列参考书目。需要提出的是本书第五章第四节《企业管理思想》曾参考了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一书。其中有几条资料直接引自该书，书中对此已作注明。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除个人藏书外，主要是利用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汉民、杜恂诚研究员曾协助查阅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徐惠平编辑经常关心本书的完成情况，并担任责任编辑。谨在此对所有支持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叶世昌

1998年9月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

商品经济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在中国古代,虽然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亦早已存在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市场进行,因此市场亦古已有之。《易·系辞下》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最原始的市场,还没有货币,各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进行物物交换。

产生货币以后,生产者先拿商品去和货币交换,然后再用交换到的货币去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这就是买卖行为。买卖更加需要市场,因此市场制度也逐步发展起来。《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管子·乘马》:“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聚”是古代的行政区域编制,一聚为 150 方里。说明《管子》作者主张每聚都要有一个市场,以满足民间商品交换的需要,免得造成民乏。

关于市场的管理,《周礼·地官司徒下》中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每 50 里有市。市场每天分三市:“大市,日昃(午后)而市,百族(指贵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管理市场的最高长官为司市,以下有质人、廛人,泉府、司门、司关、胥司、贾司、司赀(暴)、司稽、胥等。《周礼》所记有理想成

分,但反映了先秦已形成一定的市场管理制度。

战国至西汉,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西汉文帝时,晁错指出当时的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①,反映了商人势力的壮大。

汉武帝时财政开支浩繁,为解决财政困难,任用桑弘羊等,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官营工商业政策。王莽时仍实行盐铁酒官营。东汉初年也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到章和二年(88年)和帝即位后废除。

东汉末年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后又陷于分裂。北方形成了各族长期混战的局面,南方则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商品经济严重衰退,物物交换或以谷帛为币盛行。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在缓慢地恢复。南方快于北方。

隋代也只有短暂的统一。唐前期社会稳定,经济走向繁荣。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安(治今陕西西安)和洛阳。长安分为东西市,东市有220行,还出现夜市。洛阳有南市和大同市,南市有120行,大同市有66行。其次则有扬州、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广州、泉州、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昇州(治今江苏南京)、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荆州(治今湖北江陵)、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等。广州是最大的对外通商城市。非州县治地的市场有草市、墟市、集市、庙会等。对外贸易活跃,许多外国商人在中国经商。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苛敛繁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实行食盐官营。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盐铁铸钱使刘晏改革盐法,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产之盐,卖于商人,任盐商贩运

^① 《汉书·食货志上》。

销售各地,沿途不再征税。此后食盐一直成为国家的征榷对象,但具体政策各时期则有变化。唐以后茶也成为一种专卖商品。

北宋商业的规模又远胜于唐代。唐代的都市,坊(住宅区)、市分区设立,交易聚散有一定时间。北宋已打破坊、市的限制。汴京人口超过100万,各街巷都有商店,小贩到处叫卖,交易时间从天明直至深夜,热闹的地方甚至通宵营业。全国有许多商业城市和镇市,有些大商业城市已成为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城市。海外贸易设市舶司管理,设市舶司的地区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治今上海松江)等。许多外国商人在中国经商,甚至世代久居中国。宋神宗时,王安石曾进行变法。其中同商业有关的是均输法和市易法。市易法是在京师及一些城市的市场进行管理。

南宋商业盛于北宋,临安(治今浙江杭州)的繁荣也超过了汴京,包括所属九县共124万人。同业组织有行、团、市、作之分,总计有414行。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①。南宋和金、夏都有贸易关系。在温州、澈浦、上海、江阴等地增设市舶务或市舶场,发展海外贸易。泉州和五十余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关系。北方因金朝南侵,曾遭受严重破坏。金熙宗时(1135—1149年)实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的政策,商业也逐渐恢复和发展。

元代幅员辽阔,海陆交通发达,商业亦比较发展。市舶司的设置最多时达七处: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治今浙江宁波)。

明代在农业、手工业大有进步的基础上,达到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宣德四年(1429年)为了推行钞法,向三十三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增加市镇店肆门摊税,这三十三府州县为: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今仪征)、杭州、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夜市》。

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多数靠近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今江浙地区占了三分之一。此外还产生了许多新兴城镇，江南市镇发展尤为迅速，密度也最大。

明代的对外贸易起初通过朝贡进行，后人称为“朝贡贸易”。对私人的海外贸易则予以禁止。隆庆时(1567—1572年)局部开放海禁，此后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人开始东来。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荷兰人占领了台湾。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为防止郑成功的进攻，实行海禁。十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廷又实行迁海政策，将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二十二年台湾归入清版图，于次年开放了江苏至广东的海禁(十九年先开放山东海禁)，并在泉州、广州、松江(上海)、宁波设立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海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处。鸦片战争前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等。英国逐渐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通商国家。

中英贸易英国常处于入超地位。中国的茶叶、丝绸、土布、砂糖、大黄、陶瓷等为主要出口商品。英国的贸易入超，必须运大量白银到中国抵补货款。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制造和贩卖鸦片的特权，从此鸦片源源不断地走私进入中国，既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又改变了白银的流向，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嘉庆元年(1796年)中国开始禁止鸦片进口。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到广东禁烟。英国为维持其鸦片贸易的利益，悍然发动了不义的侵华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商品经济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言，市场经济则指由市场调节商品生

产和流通而言。有商品经济必然有市场经济。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也自然不是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经济,其作用的范围很有限。

有市场经济必有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古代从战国中期产生抑商思想,以后一直有很大影响,这对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起着束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反对抑商的思想,而且即使主张抑商的人也可能肯定市场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思想虽然比较薄弱,却仍有一定的发展。

相传周文王时,“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资贵而来,贵物益贱,资贱物,出贵物,以通其器”。实行有利于工商业的政策,不仅提高了本国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而且吸引了外商来周朝经商,他们运进价贵的商品,交换国内价贱的商品。这就做到了“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①。意思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促进物资交流,物价平稳,有利于工商业者的经营,还可以做到“无穷乏”。

《管子·轻重》^②中的理论是国家控制经济的理论。《轻重》作者指出商品买卖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别,“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虞(偿)本之事”。国君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③。因此,国君要干预市场,凭借“号令”的作用,通过控制货币或商品来控制物价,做到贱买贵卖,调节商品的供求和物价,国君亦从而获得“什倍之利”。《轻重》理论主张由国家调节市场经济,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只是过分强调了封建国家的调控能力和国家的财政利益,又使这种理论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桑弘羊的官营工商业政策就是《管子·轻重》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实施。

① 《逸周书·大聚》。

② 《管子·轻重》现存十六篇,各有篇名,属西汉作品。

③ 《管子·国蓄》。

西汉的司马迁是市场经济的积极主张者，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很好的论述。他肯定了人们的求利活动，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他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即顺其自然，“利导之”是以利来引导人民，“教诲之”是指以道德约束人民的活动，“整齐之”如抑兼并之类，“与之争”指官营工商业政策。司马迁认为“因之”之策最好，也就是国家不要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认为这样可以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使财富不断地生产出来。这种主张并不专对市场经济而言，但市场经济显然也包含在内。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在清末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料。

唐代的刘晏是很懂得市场经济作用的人。他“自言如见钱流地上”^①，即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可以有许多生财的门路。他实行的盐法重视发挥商人的积极性，被后人认为是一种最理想的盐制。他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革漕运取得了成功。唐代从江南运漕粮到长安，困难很大。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运输路线受阻。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由刘晏负责漕运。他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由润州运至扬子（治今江苏邗江南），由扬子运至河阴（治今河南荥阳北），再由河阴运至渭口，渭口运至太仓，做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②。他不征发丁男，由官府出钱雇民工运输，派兵护送。原来从润州到扬子，每斗米运费19钱，刘晏的办法只要4钱；从扬子到河阴，每斗米运费120钱，刘晏的办法只要30钱。这是刘晏运用市场经济原则节省开支的表现，说明他懂得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能大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刘晏并不

①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注意进行管理。他实行了常平盐和常平法，及时掌握盐价和物价的变动情况，采取措施，做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①。刘晏的物价管理是中国古代对市场管理得最成功的一次。

唐宋以后的盐、茶专卖，由于官府垄断经营，产生了许多弊病。因此许多思想家主张实行放手让商人经营的政策，宋人称这种政策为“通商”。这主张反映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认识。以下只举宋仁宗时学者李觏的通商观点为代表。他写有《富国策》十篇^②，最后两篇即分别讨论了盐、茶的专卖和通商问题。

李觏分析了食盐专卖的弊病。在运盐时，“军之穷、吏之狡者，家于是，食于是，私卖其什之几，而足以它物”；在贮于仓库后，则掌管者“又私卖其什之几，而足以它物”。这样就使“公盐常失其半”，还有一半是他物，使民户所买“常不啻以倍价取半盐”。“公盐贵而污，私盐贱而洁”，对比鲜明，造成官盐的滞销。李觏提出“莫如通商”，官府把盐巢于商人，再由商人销售。官府从巢盐中取得一笔收入，又可以收取关市之税，而费用节省，这是公利不减。商人人数众多，盐的质量又高，还可以赊销，盐必能畅销而无滞。

李觏指出公茶也同样存在弊病。质量滥恶，民不肯买，以至堆在仓库里腐败变质，官府的投资“息未收而本或丧矣”。私茶则相反：“来有甚远，价有甚贵，而人争取者，味美也。涂有甚险，法有甚重，而人争贩之者，利厚也。”解决的办法“亦莫如一切通商”。政府只抽税而不买卖，买卖由商人自营。李觏分析其优点为：“且商人自市，则所择必精；所择精，则使之必售；使之售，则商人众；商人众，则入税多矣。”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所以“利国便民，莫善于此”。

明代官至大学士的丘濬主张对商业采取放任的政策。他在成

①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② 《李觏集》卷一六。

化年间(1465—1487年)著《大学衍义补》，仿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而“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其中卷二五的《市采之令》阐述他对商业和市场的一些观点。

丘濬认为从民食考虑，政府应该实行平糴政策以调节粮价，这样粮食“虽收于官，亦是为民”。除此以外，则政府绝对不能经商，经商就是与商贾争利。他批评桑弘羊使“商贾无所牟利”的主张说：“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为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他又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说：“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对于政府经商“乘时贵贱以为敛散”，“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的主张，丘濬也予以否定。他说：“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否定的理由有二，一是民有即是君有，一是囤积居奇有利于平抑物价。这两条理由都比较牵强。君富虽以民富为基础，但民富并不就是君富，而且商贾的富还可能造成某些人的贫，贫富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至于囤积居奇，则可能人为地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不至甚贵”并不是普遍规律。总之，丘濬主张除粮食市场外，应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给商人以经营的充分自由。这反映了他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的肯定。中国古代的官营工商业和抑商政策有很多弊病，丘濬的自由经营主张切中了时弊，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否定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又走向了另一极端。

中国古代有些思想家还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加就业。《管子·侈靡》认为富人的奢侈有利于穷人的谋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穷人“动肢而得食”。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发生灾荒，知杭州的范仲淹用宴游和公私兴造的办法来救荒。他说

这样做“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①。这一年两浙只有杭州能晏然度过灾荒。明人陆楫提出了反对禁奢的主张，他说苏、杭俗奢，“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鬻者不知其几”^②。苏、杭富人的奢侈培育了市场，使许多出卖商品和劳动力的人获得了收入。鸦片战争前，魏源也主张富人应该奢侈，“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拉扯），酒食鼓瑟之愉快，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③。

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思想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自然还有许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言论未曾提及。以上所说的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起点，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的深刻变化。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阶段和本书的结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对外开放。中国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中国的市场在原有的基础上加速发展，逐步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已不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期间的中国市场也只能是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的市场。

但是中国人民决不愿意永远受人宰割。许多志士仁人探求中国的富强之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先后提出了许多救中国的理论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

② 《蓬窗杂录著摘抄》。

③ 《魏源集》上册《治篇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